

操纵理论视域下文旅外宣文本翻译策略研究

——以许槌纪念馆讲解词为例

朱康颖

[摘要] 全球化背景下, 文旅外宣文本翻译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与文化传播的重要环节。作为地方文化形象的核心载体, 许槌纪念馆游客讲解词的翻译不仅承担着历史信息传递的功能, 更肩负着传播地方文化价值的使命。以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为框架, 选取许槌纪念馆游客讲解词的中英文本为研究对象, 从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三个维度, 系统探究文旅外宣文本翻译的策略选择。在意识形态层面, 译者通过文化意象转译等策略, 调和中外文化认知差异, 突显许槌的思想文化影响。在诗学层面, 中文讲解词中隐喻手法被重构为符合英语叙事逻辑的表达, 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在赞助人层面, 译文通过调和文化符号, 确保在传播地方文化的同时捍卫文化符号的独立性。研究的创新点在于将操纵理论从文学文本拓展至文旅外宣研究, 揭示文旅翻译的独特性。研究提出, 文旅外宣翻译需在文化忠实性与受众接受度间寻求平衡, 通过跨文化修辞优化, 提升地方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可以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构建提供理论参照, 为文旅文本翻译实践与跨文化传播策略优化提供指导。

[关键词] 操纵理论; 文旅外宣; 翻译策略; 许槌纪念馆; 全球化

引言

在全球化持续推进的浪潮中, 文旅外宣文本翻译承担着文化互通与价值传递的双重使命。作为地方历史文化的核心载体, 许槌纪念馆游客讲解词不仅传递历史信息, 更肩负着塑造地方文化形象、促进跨文化理解的职责。这类文本的翻译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符号的转换——需在源语文化的独特性和目标语受众的接受逻辑之间建立动态平衡, 既不能因过度归化消解文化主体性, 亦不可因机械直译制造认知隔阂。这一复杂过程亟须系统的理论予以阐释, 而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的操纵理论为解构这一现象提供了关键视角。该理论指出, 翻译本质上是译者基于目标文化需求对原文的“改写”, 这一过程受到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三要素的协同影响^[1]。在文旅外宣文本翻译中, 译者需在文化忠实性与受众接受度之间寻求平衡, 既保留地方历史叙事的独特性, 又实现跨文化语境的有效传播。

本文以许槌纪念馆的中英讲解词为研究对象, 基于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 通过例句分析法系统探

究文旅外宣文本翻译中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研究聚焦三大核心问题: 意识形态层面, 译者如何通过术语增译(如“经世致用”译为“practical scholarship”)、价值显化(如“梅兰竹菊”转化为“symbols of integrity”)等策略, 实现儒家伦理与现代理念的跨文化对接; 诗学层面, 中文修辞结构(如对仗句、典故)如何在英语叙事中重构(如“勤学立言标素节”拆解为“Diligence in learning forged his scholarly legacy”), 以平衡文化独特性与受众可读性; 赞助人层面, 地方文旅部门如何通过术语库建设、审校制度等, 引导译者弱化敏感表述(如“刻书”译为“publish books”), 塑造正向文化输出的地方品牌形象。

本研究将操纵理论从传统文学文本研究拓展至文旅外宣领域, 揭示文旅翻译的独特性。研究旨在推动中国文旅外宣文本翻译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定义转型, 为外宣构建特色对外话语体系提供理论参照, 同时为地方文旅外宣文本翻译的实践与跨文化传播策略优化提供方法论启示。

基金项目: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2024 年院级一般课题“操纵理论视域下当代中国外宣文本翻译策略研究”(2024dfy015)。

作者简介: 朱康颖(1999—), 女, 江苏镇江人, 硕士研究生, 助教,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一、操纵理论的核心与适用性

（一）操纵理论概述

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领域逐渐形成文化学派。该学派以玛丽·斯内尔·霍恩比、安德烈·勒菲弗尔及苏珊·巴斯内特为代表,其核心观点推动了翻译研究向文化领域的转型。苏珊·巴斯内特与安德烈·勒菲弗尔在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中强调翻译与社会、文化的关联,进一步巩固了文化转向的理论基础。文化学派学者认为,文本并非固定的语言复制品,而是译者基于对原文本意图的深刻理解,通过创新性手段实现的跨文化语言实践^[2]。因此,翻译的本质被界定为“文化干预与操纵”^[3]。

“操纵”概念最早由翻译理论家西奥·赫曼斯提出,他指出“翻译是从目标文学视角出发,为特定目的对源文本进行的操纵”。安德烈·勒菲弗尔在此基础上系统化发展出操纵理论,明确提出“翻译即对原文的改写或操纵”^[4]。

（二）操纵理论的三大制约因素

安德烈·勒菲弗尔指出,文学作为文化系统的子系统,其内部元素相互关联且受内外因素制约。内部因素包括诗学与意识形态,二者随时空变迁而变化;外部因素则为赞助人,其既能促进文学传播,亦可能压制或摧毁文学发展^[5]。

1.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指反映特定经济基础、阶级或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观念体系,涵盖法律、道德、艺术等领域的观念^[6]。广义上可引申为社会观念,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其直接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及对原文本语言与文化的处理方式。例如,译者可能因避免目标语境的误解而删改争议内容。译者要在职业伦理与文化忠诚间寻求平衡:一方面要履行翻译职责,另一方面要适应目标语言的社会文化框架。

2. 诗学

诗学包含文学技巧(如主题、原型、场景)与文学的社会功能^[7]。特定时期的诗学规范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忽视文学性的直译将导致美学价值流失。安德烈·勒菲弗尔指出,翻译是不同诗学系统互渗的桥梁。译者常以目标文化的诗学规范改写原文,因此,译者又被称为“妥协的艺术家”。

3. 赞助人

赞助机制是能够促进、引导甚至阻碍文学作品翻译

与传播的个人或机构。其范围非常广泛,可以是出版商、媒体、评论家、政治团体、教育机构乃至皇室贵族等。赞助人通过控制翻译的经济来源和出版渠道,对意识形态和诗学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从而操纵翻译的整个过程。安德烈·勒菲弗尔指出,赞助人通常更关心文学的意识形态,而将诗学方面的具体处理权“委托”给译者或文学专家。赞助方通过经济与社会地位对译者施加影响,译者若希望译作出版,往往不得不妥协^[8]。

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理论深刻揭示了翻译活动并非纯粹的语言转换,而是一个在特定社会文化权力网络中进行的复杂重构过程。译者在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这三重约束下,对原作进行有目的的改写,使其能够在一个新的文化体系中被接受、流通并发挥作用。这种“改写”既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操纵”,它能够塑造异域作者和作品在目标文化中的形象,甚至推动文学和社会的演进。

（三）操纵理论对文旅外宣文本翻译的适用性

文旅外宣文本翻译是指将历史、文化、艺术等特色信息转换为外语,面向国际受众进行传播的翻译活动。中国文旅外宣文本翻译的特殊性在于文化主导性、受众导向性以叙事逻辑的双向适配性^[9]。

从操纵理论的视角审视,文旅外宣翻译的整个过程与勒菲弗尔提出的三大控制因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高度契合,从而证明了该理论的适用性。首先,文旅外宣的核心目标是“讲好中国故事”,本身就蕴含着强烈的文化导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主动选择并塑造符合文化形象定位、能够引发国际受众正面情感共鸣的文化叙事。这不仅仅是语言转换,更是对原作文化价值的筛选与重塑。其次,文旅翻译对“叙事重构”的需求与诗学规范的制约密不可分。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拥有迥异的审美习惯和文本接受模式。例如,中文宣传文本中常见的华丽辞藻、四字格言在目标语市场可能显得冗长或生硬。因此,译者必须依据目标语文化的“诗学”,即其主流的、读者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和体裁规范,对原文进行改写。这就会涉及调整信息顺序、转换修辞手法、简化复杂概念,其本质是为了迎合目标读者的阅读期待,实现有效传播,也是诗学规范对翻译实践的“操纵”。最后,文旅外宣活动通常由文旅部门或相关文化机构发起和资助,这些机构扮演了“赞助人”的角色,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翻译的内容和风格。因此,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理论框架不仅揭示了文旅外宣翻译中“文化忠

实性”与“传播有效性”之间通过“操纵”或“改写”达成的动态平衡，也为分析和优化地方文化国际传播策略提供了一个清晰、立体的结构性视角。

二、操纵理论在文旅外宣文本翻译中的应用

（一）意识形态

翻译中意识形态的影响分为两方面，首先是译者基于自身的社会立场，对文本进行重构，实现正确全面的形象构建。其次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动调适，使译介策略与目标语主流价值体系相契合。在许槌纪念馆介绍词中具体体现如下：

例 1：许槌是学问人品俱佳的一代廉吏。

译文：Xu Lian was a model official renowned for his scholarly excellence and moral integrity.（转换法）

原文“廉吏”直译为“incorruptible official”可能隐含“反贪腐”的联想。译者选择“model official”，弱化“廉”的单一廉洁属性，转而强调许槌作为官员的全面典范性，既符合文旅外宣中“正向文化传播”的要求，又规避了敏感联想。“moral integrity”在英语语境中具有普适性，这种译法将许槌的个人品德升华为跨文化语境中的“治理典范”，既保留文化独特性，服务于地方文旅形象建构，又对接国际话语体系，契合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传播需求。

例 2：许氏家族诗礼传家、清正廉洁的家风。

译文：The Xu family upheld a tradition of scholarly pursuits and ethical governance.（转换法）

此处将“诗礼传家”转化为“scholarly pursuits”，弱化儒家礼教的文化负载；将“清正廉洁”译为“ethical governance”，从个人品德升华为治理伦理，对接国际公共管理话语体系，提升文化价值的普适性；将“家风”译为“tradition”，弱化儒家宗族制度的封建性，强化家族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形象，符合文旅外宣塑造地方文化品牌的需求，同时兼顾英语受众社会文化背景，增强可读性。

（二）诗学

诗学的影响方式是导向型改写，旨在使译入文本符合目标语文学传统与认知框架^[10]。因此，译者在翻译时需系统考量目标语受众的文体偏好及思维模式。中文重意合，句子间逻辑连接较隐晦，且较多使用成语、谚语等表达，而英文重形合，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对中文的隐喻性表达加以解释说明，且在处理隐性逻辑关系时需显化连接词，增强句子间的逻辑性连接。具体表现如下：

例 1：文采渊雅、品端学粹、服官刚直、政声清惠。

译文：He was erudite in literature, impeccable in conduct, resolute in governance, and revered for his integrity.（增译法、归化法）

原文四组四字短语构成排比，体现了文旅外宣文本的文艺性与节奏感。译者将其转换为四个平行形容词短语，通过“in+ 名词”结构明确许槌各优势品质的领域，既保留原文的并列逻辑，又符合英语形合语言的特点。这种处理通过平衡韵律与逻辑，实现从中文“意合”到英文“形合”的诗学适配，在诗学层面实现了从中文修辞美学到英文叙事规范的创造性改写。这一策略既保留了原文的权威性，又通过目标语受众熟悉的表达形式增强可读性，体现了文旅外宣文本翻译中“文化独特性”与“传播有效性”的辩证统一。

例 2：梅花探波傲雪，剪雪裁冰，一身傲骨。

译文：The plum blossom, defying harsh winters with its unyielding spirit, symbolizes Xu Lian's unwavering resolve.（省译法、增译法、转换法）

原文通过拟人化自然意象构建梅花的动态美感，但直译可能因文化隔阂导致理解障碍。译文将具体动作简化为“defying harsh winters”，即“对抗寒冬”，剥离细节描写，转而通过“unyielding spirit”概括梅花的文化象征，既保留坚韧特质，又避免冗余。原文依赖语境传递隐喻，译文通过“symbolizes”直接点明梅花与许槌品质的关联，显化原文隐含的类比逻辑。这种调整将诗意隐喻转化为线性叙事，符合英语受众对明确因果关系的期待。

（三）赞助人

在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中，赞助人指代能够通过权力、资本或地位对翻译活动施加影响的个体或机构。赞助人通过制度性手段直接或间接影响翻译目标、内容与形式，其核心职能是确保译文符合特定文化要求与诗学规范^[1]。作为外宣文本，许槌纪念馆讲解词的赞助人应为许槌纪念馆和当地文旅部门，其主要诉求应为正确传递历史文化、塑造当地文旅形象、提升传播可接受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英文翻译的策略选取。

例 1：许槌在病中还写成《识字略》一书。

译文：Even during his illness, Xu Lian completed Shi Zi Lue, a groundbreaking study on philology.（异化法、增译法）

原文《识字略》首先采取直接音译，是异化策略，赞助人的意图是保留原名的语言形态，将其作为独立的文化符号引入国际语境，避免因翻译简化导致的文化扁平化。在音译后补充“a groundbreaking study on philology”，既保留原名的文化独特性，又通过学术标签

建立跨文化认知桥梁,强化许榧“跨领域学者”的形象,服务于地方文旅品牌对“文化名人”的推广需求。这种“形式保留+意义阐释”的双轨策略,既避免文化误读,又确保国际传播中文化符号的准确性与一致性。

例2:许榧刻书共十九种,涉及法学、医学等各大领域。

译文: Xu Lian published nineteen influential works spanning law, medicine, and other disciplines.(转化法、增译法)

原文刻书指传统雕版印刷,直译为“carve”易引发技术性误解。赞助人通过术语规范要求译为“publish”,既符合现代出版概念,又规避文化隔阂,确保国际受众直观理解许榧的学术贡献。此外,译文增译“influential”,即“有影响力的”,强化许榧著作的学术价值,体现赞助人对“文化名人”品牌塑造的导向性要求。译文通过术语现代化与学科标签优化,将许榧的传统刻书行为与学术成就挂钩,既维护了地方文化叙事的权威性,又实现了文旅品牌价值的国际化输出,这一策略凸显了赞助人在翻译活动中对传播目标与文化安全的双重把控。

结束语

本研究以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为框架,通过对许榧纪念馆中英讲解词的深入剖析,不仅证实了该理论对文旅外宣文本翻译的强大解释力,更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三要素如何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协同作用,共同完成对源文本的“改写”。研究发现,文旅外宣文本翻译的本质是文化符号的跨语境传播,其策略选择既受地方文化主体性的制约,也需兼顾国际传播的接受逻辑。在意识形态层面,译者通过术语重构与文化意象显化实现文化价值的传播。译者继而在诗学层面进行了一系列策略性改写:通过术语重构与文化意象的显化,确保核心文化价值得以清晰传递;同时,主动将中文特有的修辞与叙事结构,转化为更符合英语受众接受习惯的表达方式。最终,诸如增译、转译文化词汇等具体手法的运用,既是诗学层面的必要调整,也是在赞助人规避文化误读、确保信息精准传达要求下的必然选择。因此,该纪念馆的中英讲解词并非原文的透明复刻,而是在多重力量制衡下,既要维系地方文化主体性,又需深度迎合国际传播逻辑的文化产品,生动诠释了文旅外宣文本翻译作为一种“文化外译”的本质。

本研究将操纵理论从文学文本研究拓展至文旅外宣领域,构建了“文化符号—传播策略”的双向分析模型,揭示了文旅翻译的独特性。同时,研究通过实例分析,

动态呈现了翻译策略对文化传播目标的作用,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研究提供了跨学科视角。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文旅外宣翻译中的多模态传播策略,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对文化术语库建设与翻译效率提升的积极作用。此外,如何在全球化与在地化并存的语境中,平衡文化主体性与传播有效性,仍需深入探索。本研究为地方文旅外宣文本的翻译实践与跨文化传播策略优化提供了方法,也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路径探索了新的理论可能性。

参考文献:

- [1] Theo Hermans.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Routledge Revivals):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14.
- [2] 刘云虹. 选择、适应、影响: 译者主体性与翻译批评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2 (4): 48-54.
- [3] 姜秋霞, 杨平. 翻译研究理论方法的哲学范式: 翻译学方法论之一 [J]. 中国翻译, 2004 (6): 10-14.
- [4] 王琼, 费金娟. 操纵翻译视角下政治外宣文本的汉法翻译策略浅析 [J]. 法国研究, 2018 (2): 96-103.
- [5] 孟阳. 中国青少年儿童文学翻译中的“折射”现象: 以曹文轩作品的韩译为例 [J]. 东北亚外语研究, 2025, 13 (1): 95-108.
- [6] GERRING J. Ideology: A definitional analysis [J].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1997, 50 (4): 957.
- [7] Ščeglov Ju K, Žolkovskij A K. Poetics as a theory of expressiveness: Towards a 'theme - expressiveness devices - text' model of literary structure [J]. Poetics, 1976, 5 (3): 207-245.
- [8] 宋以丰. 翻译社会性管窥: 基础、目的与影响因素 [J]. 东方翻译, 2017 (1): 29-34, 49.
- [9] 张勇. 文旅外宣译介的创造性叛逆与适度忠实: 以“魅力渝中观光游”解说词英译为例 [J]. 外国语文, 2020, 36 (1): 149-155.
- [10] 贺爱军, 贺宇. 改写理论视角下张元济的译外行为探究 [J]. 上海翻译, 2022 (5): 89-95.

作者单位: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